

元代歌谣的分布研究

闫雪莹

摘要：元代歌谣极富时代特点。在文献载录的频次上，以《河南北童谣》《元末苏州童谣》《方国珍谣》等被典籍载录的频次最高，其收录的频次与歌谣本事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力成正比。在时间的分布上，元代歌谣所呈现的历时性特征，与元朝的历史分期及阶段特征相吻合，基本上反映了元朝初期、中期、末期不同阶段的社会状况。在地域的分布上，以江浙行省被记录的歌谣最多，反映了江浙行省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区域特征。元代歌谣在时间的分布上集中于元末顺帝统治期间，在地域的分布上集中于江浙行省，在歌谣的主题上，时间和地域的分布基本重合，充分体现了元末的江浙行省所受压迫最深、反抗也最为激烈的历史。

关键词：元代歌谣；收录频次；时间分布；区域分布

中图分类号：I27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6-0048-08

古籍所见元代歌谣，据笔者统计凡87首。其中讽刺谣、哀怨谣、起义谣共70多首，占元代歌谣总数的五分之四。在时间的分布上，以元末顺帝统治时期最多，可考的有64首，约占元代歌谣总数的四分之三。在产生及流传地域的分布上，中书省21首，体现出大都及京畿作为政治舆论中心的特点；江浙行省数量最多，有32首，反映了江浙行省所受压迫最重的特点。中国古代歌谣的分布，如文献分布、历时性分布、地域性分布等问题，是歌谣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基础性问题。解决了这一问题，研究才会扎实，才能更好地向深度扩展。而对于古代歌谣的分布研究，学界有所忽略。元代歌谣极富时代特点，本文即以元代歌谣为例，以元代歌谣的文献分布、历时性分布和地域性分布为三个大的中心题目，探讨元代歌谣在此三方面的分布规律及内涵。

一、元代歌谣的文献分布

1. 元代歌谣在典籍中的收录情况

元代歌谣首先被收录在一些笔记和史书中，笔记如（元）孔克齐《至正直记》、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明）叶子奇《草木子》，史书如（元）权衡《庚申外史》、（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清）钱谦益《国朝群雄事略》等。史书以《元史·五行志》收录数量较多，共11首^①，均表现自然灾害后人民的困顿流离、思变起反，属于民间自发谶谣，乃“怨谤之气发于歌谣”也。近人陈衍所编《元诗纪事》是有关元代诗歌的史料性著作，其末一卷是《歌颂铭谣谚谶谜杂语》，将其所能辑到的元代谣谚尽皆收入，驳杂翔尽，共收录元代歌谣47首，是迄今收录元代歌谣最为集中的著作。诗话、方志、地方文献和小说中可零零散散地见到一些歌谣，诗话如清代郑方坤编辑的《全闽诗话》，方志如明代喻政主修的《福州府志》，清代王轩、杨笃等纂修的《山西通志》，清代于成龙等纂修的《江南通志》等，所记颂谣居多。歌谣是来自民间的声音，地方文献用来自民间的评价来肯定这些地方清官的品行和政绩。

集中收录元代歌谣的是歌谣专辑和一些诗歌总集。歌谣专辑以明代杨慎《古今风谣》始，《古今风谣》辑录元代歌谣9首。清代杜文澜《古谣谚》以辑录古代谣谚最为著称，分经史子集各部辑录上古至明代的谣谚3300多首，辑录元代歌谣共31首。其中：卷14辑录10首；卷15辑录《庚申外史》中的歌谣2首；

^①歌谣数量的统计，按单首计算。如《江西福建怨谣》、《元至正中燕京童谣》，标题虽为一个，但内含3首歌谣，统计时按3首计算。

收稿日期：2009-1-16

基金项目：本文为长春税务学院一般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歌谣及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08015。

作者简介：闫雪莹（1976-），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06级博士研究生，长春税务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卷 16 辑录 2 首；卷 30 辑录 1 首；卷 63 辑录元代笔记中的歌谣 9 首；卷 83 辑录 1 首；卷 85 辑录《古今风谣》中的元代歌谣 5 首。“至若谣谚出自构造者，辗转传播，无非起于同时之人，今并归于附录之中”，其《附录二》录此类歌谣 1 首（《至正十年河南北童谣》）。《古谣谚》对谣谚的辑录标准相当严格，其凡例中交代：对于“铸金者”、“镂玉者”、“刻石者”、“书岩者”、“榜门者”、“题壁者”、“谶纬称歌者”、“乱语作歌者”等等诸多情况皆不录，故所录元代歌谣都是书中或标题中明确为“谣”者。（清）顾嗣立、席世臣编《元诗选癸集》是最早收录元代歌谣的诗集，共收录《江南谣》《皇舅墓谣》等 9 首歌谣。

民间歌谣带有鲜明的时代性，一般歌谣反映出民众一时一地对一事一物的叙述或看法，随着时事变化，事过境迁，人们对具体的人事多有淡忘，当时流传一时的歌谣，也会被人渐渐遗忘，所以如果当时没有人记录，将口头歌谣转化为文字歌谣，大多数就不会流传后世。这些歌谣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可能遗失，而类似这样关于具体人物事件的歌谣应该很多。有些歌谣世代口耳相传，由一些歌谣爱好者或者专门的歌谣采集者直接到民间收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过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在县卷资料本的基础上编选了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56 个民族的歌谣选粹。它们中有偶见至今流传的元代歌谣，如《上海卷》刊载的 1987 年 4 月采录于上海市碧江路街道汽轮二村、徐大妹演唱、李自勉采录的《黄道婆谣》。1962 年第 6 期《民间文学》所刊登的由李东山搜集整理的《乌鸦叫叫》《纸钱飘飘》《跳龙门》等 11 首歌谣都是当代歌谣采集方面取得的成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歌谣活跃于民众口头，它们至今口耳相传而未见诸书面。这些歌谣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发挥着口述历史的作用，如“八月十五杀鞑子”谣。活着的歌谣是真正意义上“发表”了的民间歌谣。

2. 典籍收录频次较高的歌谣

笔者将 87 首元代歌谣的出处一一进行统计，发现凡是出现或引用频次较高的歌谣，那么这首歌谣及其事件或人物本身在后世的知名度必定很大。下表是元代歌谣典籍收录频次统计表：

歌谣名称	出现频次	见载的典籍
河南北童谣	18	《庚申外史》《元史·五行志》《元史·河渠志》《草木子》《七修类稿》《平胡录》《皇明资治通纪》《国初群雄事略》（引《草木子》）、《国初群雄事略》（引《元史续编》）、《元诗选癸集》《古谣谚》《罪惟录》《新元史·五行志》《新元史·河渠志》《新元史·韩林儿传》《续资治通鉴》《元诗纪事》
元末苏州童谣	10	《古今风谣》《翦胜野闻》《国初事迹》《七修类稿》《国初群雄事略》（引《国初事迹》）、《国初群雄事略》（引《太祖实录·本传》）、《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古谣谚》《元诗纪事》
方国珍谣	9	《草木子》《七修类稿》《明书》《国初群雄事略》（引《草木子》）、《国初群雄事略》（引《方氏事迹》）、《续弘简录》《元诗纪事》《古谣谚》《光绪黄岩县志》
江南谣	5	《玉堂嘉话》《南村辍耕录》《元诗选癸集》《古谣谚》《新元史》
元初蓟县皇舅墓谣	5	《南村辍耕录》《古今风谣》《元诗选癸集》《古谣谚》《元诗纪事》
元明宗时童谣	5	《平江记事》《古今风谣》《元诗选癸集》《古谣谚》《元诗纪事》
元顺帝时童谣	5	《元史》《留青日札》《元诗选癸集》《古谣谚》《元诗纪事》
至正丙申松江民间谣	5	《南村辍耕录》《元诗纪事》《元诗选癸集》《古谣谚》《新元史》
至正五年淮楚间童谣	5	《庚申外史》《元史》《古谣谚》《新元史》《元诗纪事》

除此之外，在典籍中出现 4 次的歌谣有：《元统二年彰德民谣》《至元三年彰德民谣》《至元五年八月京师童谣》《平江郡石上谶》《至正十五年京师童谣》《嘉兴民为张士信、杨完者谣》；出现 3 次的歌谣有：《雷州民为乌古孙泽歌》《颂程雪楼》《太仓谣》《京师谣》《讥伯颜太师》《江西福建怨谣》《南平民颂》《挖了石佛眼谣》《上海县谣》《至正十六年彰德路民谣》《扶箕诗》《元末湖湘中童谣》《闽清民歌》《吴妙宁谣》《斛铭》。

歌谣在典籍中被引用和收录的次数越多，说明这首歌谣流传的时间越长，传播的速度越快，更说明歌谣中的人物或事件本身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力越大。有些人物如朱元璋、刘福通、方国珍、张士诚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进程。而有些事件反映的是终元一代最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如：《元明宗时童谣》所反映的元朝统治阶级内部的帝位争夺、《河南北童谣》《方国珍谣》《元末湖湘中童谣》《芝麻歌》等所反映的元代农民战争问题、《至正十六年彰德路民谣》所反映的流民问题、《江西福建怨谣》所反映的吏治腐败问题、《扶箕诗》中侧面反映的农民起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至正十五年京师童谣》侧面反映的大都沙尘暴问题。从歌谣在典籍中出现频次的统计中能够看出元代社会的重大社会问题在当时及后世的关注及影响程度。

二、元代歌谣历时性的分布特征

在时间的分布上，元代歌谣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下表是元代歌谣时间分布情况统计表：

庙号	帝名	在任时间	首数	歌谣名称
世祖	忽必烈	至元八年（1271） - 至元三十一（1294）	7	滨州民歌、江南谣、（亡宋者谣） ^① 、元初童谣、元初蓟县皇舅墓谣、（今年五星朝斗谣）、（一紧二慢三休谣）
成宗	铁木耳	元贞元年（1295） - 大德十一年（1307）	2	雷州民为乌古孙泽歌、颂程雪楼
武宗	海山	至大元年（1307） - 至大四年（1311）		
仁宗	爱育黎拔力八达	皇庆元年（1312） - 延祐七年（1320）	3	浮梁民谣、太仓谣、（四川人谣）
英宗	硕德八剌	至治元年（1321） - 至治三年（1323）	4	至治间占、宁都州民歌、黄道婆谣、嘲许敬仁
泰定帝	也孙铁木儿	泰定元年（1324） - 致和元年（1328）		
幼主	阿速吉八	天顺元年（1328）		
明宗	和世㻋	天历二年（1329）	1	元明宗时童谣
文宗	图铁睦尔	天历元年（1328） - 至顺三年（1332）	1	信州路讖
宁宗	懿璘质班	至顺四年（1333）	0	
顺帝	妥懽贴睦尔	元统元年（1333） - 至正二十八（1368）	64	元统二年彰德民谣、至元三年彰德民谣、书省壁、京师谣、至元五年八月京师童谣、讥伯颜太师、至正辛巳杭州衣红儿童谣、京师人为脱脱丞相语、（奉使宣抚谣）、官贼歌、江西福建怨谣（3首）、嘲三宝奴、南平民颂、河南北童谣、旗联、方国珍谣、台湾处树旗谣、滴水湾父老为泰公歌、（挖了石佛眼谣）、芝麻歌、平江郡石上讖、粘国门诗、上海县谣、至正十五年京师童谣、元至正中燕京童谣（3首）、元至正中大理童谣、元顺帝时童谣、至正十六年彰德路民谣、张士诚军中谣、扶箕诗、讥省台、至正丙申松江民间谣、嘉兴民为张士诚杨完者谣、白茆塘谣、元末苏州童谣、平江讖语、无锡讖、元末湖湘中童谣、至正五年淮楚间童谣、安乡谣、萧彝翁书衣带语、曲沃民歌、武冈民颂、闽清民歌、赵烈妇歌、嘲诸司、乌鸦叫叫、纸钱飘飘、跳龙门、红火烧起来才太平、大都的城门挤炸了边、八十年的江山颠倒颠、战鼓咚咚响、英雄颂、咏弓、一心要把“至正”拉下、（胡虏无百年之运谣）、至正二十八年彰德路童谣、（杀鞑子谣）、（月光亮亮谣）
		未知年代的歌谣	5	元讖、宣城民哭邑令、吴妙宁谣、斛铭、金银珠谣

元代历史的时间跨度，若自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即位、建国号“大元”算起，至1368年元顺帝逃亡漠北，享国109年；若自宋亡之日（1276）计算，则只有93年，习惯上笼统地称之为元代百年。元朝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中间九主共仅39年的统治时期、顺帝统治时期（1333—1368）。世祖在位35年，顺帝在位时间36年，他们两人的在位时间，占了元代十一帝总共在位时间的三分之二，在位时间两头长、中间帝位频换是元代区别于其他朝代的一个特例。在世祖之前的前四汗时期系以蒙古为中心，以漠北的和林为国都，故不在本文的统计及研究范畴。元代歌谣在时间的分布上呈现出的规律，自然地将元代社会分为前期——忽必烈统治时期、中期——中间九主共仅39年的统治时期、末期——顺帝统治时期三个大的时间段，这与传统上对于元朝的历史分期自然地相吻合，也正说明元代歌谣与元代社会发展的密切关联。我们也以此来说明元代歌谣的时间分布特征：

1. 元代前期的歌谣，表现了这一时期由民族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化的思想倾向

从元朝建立到忽必烈去世，23年间各族人民的反元斗争从未间断。韩儒林所著《元朝史》将这一时期人民的反抗斗争分为两个部分：从元朝建立到至元二十年（1283）为第一阶段；至元二十年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歌谣主题也正好应照了这个划分，表现了这两个阶段人民的行动及心理变化。

《江南谣》《亡宋者谣》与《元初童谣》都是与宋末元初以伯颜为统领的元军灭宋有关，主题重大，表现的是改朝换代之际国家命运、民族命运以致普通百姓的个人命运，歌谣中流动着灭宋前后民族集体的毁灭感和惊惶心理。《江南谣》产生于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命伯颜率师伐宋前后。《玉

①有一些是未具名的歌谣，为了行文方便，统计表中对未具名歌谣均以歌谣的第一句命名，并在题目上加（）以示区别。

堂嘉话》云：“宋未下时，江南谣云：‘江南若破，百雁来过’，当时莫喻其意。及宋亡，盖知指丞相巴延也。夫荧惑之精，下散而为童谣，不尔何先事如此呢。”^①从记载来看，《江南谣》是一则讖谣。其中“丞相巴延”音译不同，系指伯颜。《南村辍耕录》卷1《江南谣》转引《玉堂嘉话》时，就记录为“丞相伯颜”。《新元史》也有同一主题的《亡宋者谣》：“亡宋者，百眼将军也。”^②“百眼将军”，“百”是概数，长着一百双眼睛的人，威力超凡，无所不能，正是这个人率领着元军将把南宋灭亡。《元初童谣》：“塔儿红，北人来作主人翁。塔儿白，南人是主北为客”，同样是蒙古族即将占领南宋人民家园的讖言。

在此之前的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就已举兵南下开始灭宋战争，其首攻目标就是南宋防御蒙古的最重要据点——襄阳。襄樊的保卫战长达六年之久，南宋广大军民浴血奋战，但终以贾似道妥协投降而告终。至元十一年（1274）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看到灭亡宋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派伯颜率军南下，对南宋实施毁灭性打击。至元十二年（1275），南宋倾其所有，组成一只13万人的精锐部队，由贾似道率领出师江上。然而伯颜率领的元军于丁家洲（今安徽铜陵北）击败宋军，以少胜多。至元十三年（1276），伯颜直抵临安，宋降。这三首歌谣的产生和流传处在元军横扫江南之时。而此时伯颜已成为元军的代名词，南宋百姓已敏感地觉察到将遭遇这个传说中长着一百双眼睛的神异人物所带来的灭顶之灾。

这一阶段，蒙元在江南的政权刚刚建立，尚不稳定，而南宋遗民思念故国，对元朝统治的反抗愤怒情绪还未平息，长沙以南就有不少以复兴赵宋为口号而煽起的起义，如至元十五年（1278）湖南置制张烈良与提刑刘应龙起义、至元十六年（1279）蕲州傅高起兵抗元、至元二十年（1283）建宁路总管黄华反元复宋以及至元二十二年（1285）西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子广王起事等等。《江南谣》《亡宋者谣》和《元初童谣》的产生和流传稍早于这些反对外来民族统治的斗争，但从主题上，这三首歌谣与当时的民族矛盾的性质是一致的。

在第二阶段（1283—1295），各族人民抗元斗争的风暴并未减退，特别是长江以南，起义仍是此起彼伏。至元二十年（1283），“江南盗贼，相挺而起，凡二百余所”。^③至元二十一年（1284），“时荆、湖、闽、广之间，兵兴无宁岁”；至元二十三年（1286），“江南归附十年，盗贼迄今未靖”；至元二十五年（1288），“江南盗贼凡四百余处。”^④《今年五星朝斗谣》：“今年五星朝斗，天崩地陷，合有圣人出”，是至元二十一年（1284）浙东台州居民王仙人与南溪人陈再起义所散布的，目的是制造舆论。至元后期的各族人民起义次数频繁，人数在十万人以上的有多次。而多数起义已不再以恢复宋朝为号召，把矛头指向元朝的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陈得芝文《元代江南之地主阶级》对元初江南地主的作为和立场分析得极其精到：“他们害怕人民的斗争更甚于害怕元朝军队，对元军和元朝南下官吏，他们常能‘周旋委曲’，‘随机应接’，从而‘雍容其间，抵巇如夷’，保有自己的产业，而‘愚氓相挺为乱’则对他们的阶级利益危害更大，江南地主权衡自己的利害，自然就纷纷投入元朝统治者的阵营，积极主动地参加镇压人民的反元起义了。”^⑤这一时期，民族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化，《今年五星朝斗谣》的主题与这一时期阶级矛盾的性质是一致的。

2. 元代中期的歌谣，表现了执政集团内部帝位争夺和行政区划改革上的弊端

成宗统治期间2首，仁宗时4首，英宗时3首，明宗、文宗统治期间各1首。元代中期，各地各民族人民起义的规模和次数，相对减少。此间元朝政治在外在表现上相对承平稳定，《雷州民为乌古孙泽歌》《颂程雪楼》《浮梁民谣》《宁都州民歌》《黄道婆谣》是此时出现的5首颂谣，其中歌谣的主角乌古孙泽、程钜夫、黄道婆也是元代赫赫有名的人物。既有对贪官污吏的恶讽，又有对清官廉吏的颂扬，从这个意义上讲，歌谣是真正的民意表达。

元朝中期是执政集团内部矛盾最为尖锐和集中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帝位的争夺上。从成宗元贞元年（1295）到宁宗至顺四年（1333），39年的时间频繁更换了九位皇帝。其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不过十数年，最短的仅仅一个多月。兄弟之间、叔侄之间，为争夺帝位手段阴险，展开血腥厮杀。而《元明宗时童谣》所反映的“明文之争”是元朝争夺帝位最为血腥和惨烈的。

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三日，元文宗图贴睦尔于大都即位，虽口称是“姑从”宗王、将相、百僚、耆老之请，“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但进一步争夺帝位的决心大致已定。同年十一月至天历二年（1329）正月，文宗数次遣使迎和世㻋。和世㻋信以为真，于当月即皇帝位于和宁之北，是为明宗。二月二十一日，文宗得知明宗已即位。五月，文宗从大都出发，北迎明宗。八月初二，文宗入见，明文兄弟二

①[元]王恽《玉堂嘉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页。

②柯劭忞《新元史》，卷159，《伯颜传》，上海古籍出版社《元史二种》本，1989年，第664页。

③《元史》卷173《崔彧传》，第4041页。

④《元史》卷15《世祖纪》，第320页。

⑤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7页。

人欢宴聚饮。而至初六日，突然宣布明宗“暴崩”。《平江记事》载：“童谣云：‘牡丹红，禾苗空；牡丹紫，禾苗死。’明年，明宗登极，五月暴崩，而庙讳乃和字也，其应不爽如此。”^①《元明宗时童谣》最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元朝贵族手足之间惨烈的帝位之争，揭示了一个导致明宗暴亡的政治阴谋。

行政区域划分改革是元代的重大改革，但因为完全是基于“分区宰割之私意”，造成管理上的诸多不便。至元二十七年，元廷在全国范围内调整行省建制，除中书省直辖山东、山西、河北等地以外，全国分置十个行中书省。元代行省的划分，吸取了历代地方军阀割据、对抗中央的教训，“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不顾区域经济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②以政治统治、军事战略需要为第一原则，人为地把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分割给若干个行省，造成了经济发展、行政管理上的诸多不便。

《平江记事》载：“元贞初升昆山为州，州治去府治七十二里。延祐中，移治太仓。未移之先，太仓江口，打碗花子遍地盛开，民谣云：‘打碗花子开，今搬州县来。’迁移之后，常有鼠狼出没厅事上，民复谣云：‘黄郎屋上走，州县住不久’。至正间，果复移回玉峯旧治。”^③还有一首在今天的川北地区仍然流传的歌谣，反映的也是元时川、陕建省时的一次行政区划调整：“四川人，生得奸，汉中调龙安。管你干不干，搭个广元县。”^④《太仓谣》和《四川人谣》讽刺的就是行省置罢分合无常、治所屡易给行政管理上带来的麻烦。行省区划不合常理，对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弊多利少。百姓已洞察元廷对行省建制改革的动机，所以说“管你干不干，搭个广元县”。

3. 元代末期的歌谣，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整体矛盾异常激化的动荡时局

顺帝统治期间，共 68 首，除 8 首是颂谣外，其他 60 首内容均为时政怨谣和起义歌谣。这两类歌谣在时间上如此集中，在数量如此之众，在中国歌谣的发展史上也是相当惊人的。这种分布特征是元代人民对蒙元统治怨恨情绪长期压抑而终于爆发的鲜明写照，非常客观地反映了元末社会的心理氛围。“在儒家的政治思想论述中，民间自发流传的即兴歌谣另有一个重要功用，就是它能够揭示民心、表达民意，因而具有论证君主统治正当性、认受性的象征意义。”^⑤这 60 首歌谣，反映民心思变的歌谣 9 首；时政舆论谣 14 首；起义歌谣若再细分各路，有张士诚起义谣 9 首，方国珍起义谣 2 首，刘福通起义谣 5 首，朱元璋起义谣 5 首，范孟端起义谣 1 首，芝麻李起义谣 2 首。

元代歌谣的历史就是元代人民斗争的历史。这些歌谣真实地再现了自然灾害和经济压迫情势下民心思变至揭竿而起的过 程，尤其是对各路起义军评价和舆论，均产生于各路征战的关键时期，其中蕴含着来自民间对时政判断的理性的光辉。从这个意义上说，歌谣是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元代歌谣区域性的分布特征

元代歌谣在地域的分布上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下表是元代歌谣地域分布情况统计表：

行省	首数	歌谣名称
江浙	32	江南谣、（亡宋者谣）、（今年五星朝斗谣）、颂程雪楼、太仓谣、黄道婆谣、信州路讖、至正辛巳杭州衣红儿童谣、江西福建怨谣（3 首）、嘲三宝奴、南平民颂、方国珍谣、台温处树旗谣、滴水湾父老为泰公歌、平江郡石上讖、上海县谣、张士诚军中谣、讥省台、至正丙申松江民间谣、嘉兴民为张士诚杨完者谣、白茆塘谣、元末苏州童谣、平江讖语、无锡讖、至正五年淮楚间童谣、闽清民歌、赵烈妇歌、宣城民哭邑令、吴妙宁谣、斛铭
中书省	21	元初童谣、元初蓀县皇舅墓谣、滨州民歌、嘲许敬仁、元明宗时童谣、元统二年彰德民谣、至元三年彰德民谣、京师谣、至元五年八月京师童谣、京师人为脱脱丞相语、（挖了石佛眼谣）、至正十五年京师童谣、元至正中燕京童谣（3 首）、元顺帝时童谣、至正十六年彰德路民谣、曲沃民歌、至正二十八年彰德路童谣、大都的城门挤炸了边、英雄颂
河南江北	6	书省壁、河南北童谣、旗联、芝麻歌、粘国门诗、安乡谣
江西	4	浮梁民谣、宁都州民歌、讥伯颜太师、萧彝翁书衣带语
湖广	3	雷州民为乌古孙泽歌、元末湖湘中童谣、武冈民谣
云南	2	至治间占、元至正中大理童谣
陕西四川	1	（四川人谣）
甘肃	0	
岭北	0	

①[元]高德基《平江记事》，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2 页。
②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97 年第 5 期，第 93 页。
③[元]高德基《平江记事》，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7 页。
④邢群麟，姚迪雷《和名家一起纵览元朝雄图》，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 年，第 140 页。
⑤吕宗力《略论民间歌谣在汉代的政治作用及相关迷思》，《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9 期，第 109 页。

无法确定 流传区域	18	(一紧二慢三休谣)、元讖、(奉使宣抚谣)、官贼歌、扶箕诗、嘲诸司、乌鸦叫叫、纸钱飘飘、跳龙门、红火烧起来才太平、八十年的江山颠倒颠、战鼓咚咚响、咏弓、一心要把“至正”拉下、(胡虏无百年之运谣)、(杀鞑子谣)、(月光亮亮谣)、金银珠谣
--------------	----	--

元代歌谣就其产生及流传的地域来看，分布极不均匀。其中江浙行省最多，32首；中书省次之，21首；河南江北行省又次之，6首。以下为湖广行省，3首；云南行省，2首。而甘肃行省、岭北行省尚未在文献中看到元代歌谣（如细查地方志，或许能有一些发现）。元代歌谣的数量在地域上分布如此悬殊，探究其原因，主要是与各行省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状况有关。

1. 京师是利剑所指之处，是全国舆论的中心，尤其是政治舆论最喧嚣的地方

京师自古就是国之大事的策源地，是全国政治神经最敏感的地区。翻检《古谣谚》，历代正史中存有大量的“京师谣”，尤以《汉书》《后汉书》《晋书》的记载为多，新旧《唐书》、《宋史》《元史》《明史》次之。元代大都，既是政治中心，又是舆论中心，因此京师谣相对集中。其中汉蒙的政权争夺、蒙元衰亡是舆论的中心内容。

《元初童谣》和《至正二十八年彰德路童谣》是表现主题相当一致的一对歌谣。《元初童谣》载于（明）刘侗、于奕正著的《帝京景物略》：“白塔寺，元初，有童谣曰：‘塔儿红，北人来作主人翁。塔儿白，南人是主北为客。’世祖时，塔色焰赤，及我太祖兵起淮阳，塔白如故。”白塔现位于北京阜成门阜内大街妙应寺。这首歌谣最智慧之处在于，预言家于元初就根据白塔寺塔色受异常天象影响而发生的变化预测出宋元明三代的政权更替：塔儿红时，蒙古灭宋；塔儿白时，明灭元。这是一首典型的讖谣，疑是明人附会或者是朱元璋起兵时带有强烈政治动机的舆论宣传。《至正二十八年彰德路童谣》载于《元史·五行志》：“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这两首歌谣除了前后两句颠倒了语序，个别字词有所调整外，主题表达是完全相同的。所谓塔儿或红或白或黑，只是利用大都妙应寺白塔出现的反常景象起兴。“北人来作主人翁”与“北人作主南人客”相对，说的是蒙元灭宋；“南人是主北为客”与“朱衣人作主人公”相对，说的是朱元璋灭元，政权又重新回到汉民族手中。民族意识和政权的主客关系在一首精炼的歌谣中就已经体现殆尽。又有《元末真定童谣》云：“塔儿白，北人是主南人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公”，与此二首歌谣表现主题完全相同，当是歌谣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变异。

《元初蓑县皇舅墓谣》也是表现元朝兴衰命运的讖谣。这首歌谣拿皇舅墓的风水说事：“河间路景州蓑县河浒一土阜，相传为皇舅墓。自国家奄混区夏，即有谣云：‘皇舅墓门闭，运粮向北去。水泔墓门开，运粮却回来。’至正辛卯，中原大水，舟行木杪间。及水退，土阜崩圯，墓门显露。继后天下多事，海道不通。”至正十一年（1351）中原发大水，将景州一土阜淹没，等到大水退去，土阜崩塌，老百姓认为这是王朝更替之象。因为在墓门未显露时，天下太平，由江南运送物资向北去，向元朝统治者进粮。而墓门显露后，运粮船只向南去，元朝统治者已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权势，元朝走向衰亡。《南村辍耕录》中所说的“继后天下多事，海道不通”，实指大规模的民变爆发后，海路断绝。在江南地区湖北有徐寿辉，安徽有朱元璋，江苏有张士诚，三支起义军把元朝统治拦腰一刀，南北切断。《元初蓑县皇舅墓谣》正是反映农民起义的大规模爆发对元朝统治所造成的重创，仅从运粮的方向——北去还是南去，就可断言元朝正在走向衰亡。

至元五年（1339）京师流传一则童谣，也是预测元廷政局将有大变：“白雁往南飞，马札望北跳。”歌谣中“马札”当为“蚂蚱”^①，预言蒙元王朝必败，逃回漠北老家。《至正十五年京师童谣》“一阵黄风一阵沙，千里万里无人家，回头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马。”^②预言朱元璋将力克群雄，灭掉元朝。此外，《元统二年彰德民谣》《至元三年彰德民谣》《元顺帝时童谣》《至正十六年彰德路民谣》是借助自然灾异而生发的民心思变的舆论；《元明宗时童谣》《京师谣》和《京师人为脱脱丞相语》是京城对明宗暴崩、伯颜专权以及脱脱开河的舆论。在地域分布上，京师歌谣集中，剑指皇帝大臣、评议朝政，这不仅元代歌谣，也是历代歌谣分布的一大特点。

2. 江浙行省社会矛盾最为尖锐，宣传歌谣为起义制造引导舆论，自发歌谣对起义事态进行评价、预测

江南歌谣最多的原因，一是江南百姓社会地位最低、经济压迫最重，造成民怨沸腾，起义迭起，故而产生的歌谣也最多。早在元初，江南的官僚和地主就无耻羞恶地献降于元军，利用忽必烈的招降和笼络政策，不但维持了原有的经济地位，而且还依靠政治势力扩大了规模。江南豪族倚势凌虐贫民，隐占官田，及强夺民田。《元史》卷23《武宗本纪》云：“江南平垂四十年……其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

① “马札”所指说法不一，一说指“胡床”，一说为“蚂蚱”，一说指伯颜的弟弟马札儿台。据清人赵一清《东潜文稿·重修定州同房村蚂蚱庙碑记》，当以“蚂蚱”为是。

② 《元史》卷51，《五行》二，第1107页。“三眼和尚”指朱元璋，“三眼”意为超常；“瞎马”指遍体疮痍大势已去的元朝。

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其力可知。”《元典章》卷24租税条云：“有更田多富户每一年有收32万石租子的占着二三千户佃户。”其后又有纳粟补官的途径，富者以此求进，形成了各族地主阶级的合流。所谓江山易而其势不衰。江南贫富悬殊日巨。蒙思明著《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和陈得芝文《元代江南之地主阶级》对元代江南的地主阶级与蒙元统治阶级联手合流、惨酷压榨百姓的社会实况考证得最为宏富精审，着力指出元代人民的斗争，“是兼有两类矛盾的性质，而没有此升彼降，此重彼轻的问题。”^①“元代江南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无疑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②

在中书省和十个行省中，江南三省每年所征税粮近650万石，占全国总数的二分之一强，而江浙一省就征近450万石，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强，京都“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③。“江南之田，自宋末至元、明以来，出重赋非一朝一夕矣。明祖时已知粮额太重，洪武七年，诏减苏、松、嘉、湖极重田租之半。十三年，又特诏减十之二。”^④江南百姓所受压迫深重，故怨谣自生。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心思变，摆脱压迫、要求平等、恢复主权成为各部起义的实际目标和精神口号。歌谣行使发泄怨气和批判社会的功能，如《奉使宣抚谣》《官贼歌》《江西福建怨谣》等，揭示了官民之间的激烈对立。

二是歌谣围绕起义领袖进行宣传、推断、评价，表达民意。反元主要势力方国珍、张士诚、朱元璋都位于南方，刘福通起事之时地处河南江北行省，以致两行省歌谣数量集中。

前文已将起义歌谣细分各路，这些歌谣从创作者的角度又可以大体分为两类：宣传类歌谣和自发类歌谣。宣传类歌谣是起义领袖把歌谣作为制造舆论的工具，在最关键的时刻如发动起义、攻城占地之前大范围地散布，其作用是制造舆论声势，争取民众的拥护；鼓舞军队士气，凝聚内部的力量。这也正如毛泽东所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歌谣发挥着口号的作用，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如《扶箕诗》：“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⑤。自发类歌谣是平民百姓根据起义军的发展态势，预测、评价起义进程和未来，这类歌谣多在起义的成败转折点，或者触动百姓切身利益时产生和流传。其作用是客观评点起义走势（类似今天的新闻评论）；对触动百姓利益者抒发怨恨憎恨的情绪，对拥护的起义队伍发出赞赏鼓励的声音。

元末白莲教领袖韩山童、刘福通所造的《河南北童谣》，多称为“石人谣”，直接推动了元代灭亡的进程，是典型的宣传类歌谣。《河南北童谣》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轰动，产生如此巨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在于它选择了当时民怨最沸腾、人员最集中的治河工地。《河南北童谣》的制作和传播无疑是歌谣传播史上的最顶级、最成功案例之一，它和陈胜吴广起义“鱼腹藏书”所散布的“大楚兴，陈胜王”一样，流动着睿智的谋略，推动事态向着既定的方向发展。至正十一年（1351），黄河暴溢，元朝政府强征汴梁、大名等13路15万民工和庐州（今安徽合肥）等18翼2万军队（用来监工）修治决口的黄河。在此前，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已开始向百姓中宣传“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在黄河南北散布谶谣：“石人一双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在谶谣的口耳相传中，人心即已达到鼎沸。同时，刘福通等人又暗凿一背后锯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独眼石人，掩埋于预定工地。至正十一年（1351），石人被民工挖出，当即轰动黄河两岸，河工“相为惊诧而谋乱”，一时“贫者从乱如归”“曾不旬月，从之者殆数万”^⑥，拉开了元末红巾军起义的序幕。

由于“石人谣”对红巾军起义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立刻有人加以效仿，作为“石人谣”传播的一种延续。当时北自濮州，南至遂安间的广大地区便流传二句童谣：“挖了石佛眼，当时木子反。”^⑦芝麻李于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在徐州揭起反帜。该谣应是他预先散布，用以预示“木子李”姓造反合乎天意，达到人心归顺、疾速响应的目的。另外，如《方国珍谣》：“杨嶼青，出贼精”^⑧，《至正二十八年彰德路童谣》：“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⑨，分别是方国珍和朱元璋起义集团预先散布的歌谣，为引导舆论做准备。

自发类歌谣以对张士诚起义几个关键战役的歌谣舆论为代表，有褒有贬。至正十五年（1355），张士诚起义军占领了通州、常熟，松江府官员惊骇不已，印了许多“官号”发给官吏和兵士佩带，“号之制作，

①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②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8页。

③《元史》卷93，《食货》一，第1103页。

④[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70页。

⑤[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43页。

⑥[明]叶子奇《草木子》，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9页。

⑦[清]钱谦益撰，张德信、韩志远点校《国初群雄事略》，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页。

⑧[明]叶子奇《草木子》，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9页。

⑨《元史》卷51，《五行》二，第1103页。

画为圆圈，绕圈皆火焰，圈之内一“府”字，以防止张士诚军潜入城内。不想被百姓嘲笑，利用官服图案编成了歌谣：“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松江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独特的方式欢迎张士诚义军的到来。至正十七年（1357）年八月，张士诚以水师数万攻嘉兴。嘉兴路的镇防甚为坚固，守将杨完者统帅“苗、僚”武装大破张士诚军，斩首万七千级，俘者数千。但是杨完者部凶肆残暴，掠人货钱，淫污信宿。民间有谣曰：“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①表达百姓对张士诚的支持，对杨完者的愤怒。

贬义的自发类歌谣如《白茆塘谣》和《苏州民为张士信等谣》。两首歌谣都发生在张士诚复称吴王，降元举动已大失人心后。至正二十三年（1363）冬，张士诚为一郡安居，保障城池永固，在常熟疏浚白茆塘，有歌谣传唱：“好条白茆塘，只是开不全，若还开得全，好与西帅歇战船。”^②“西帅”指朱元璋，可见吴中人心已转向朱元璋了。《苏州民为张士信等谣》对张士诚任用非人进行辛辣的讥讽：“亟相作事业，专用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至正二十七年九月（1367年），张士诚为朱元璋所败。结局正如民谣所言，张士信中炮而死，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三人皆被刳肠，风干其尸。

结 语

综上所述，元代歌谣在文献的载录上，多数散见于笔记、史书、诗话、方志和地方等文献，而辑录元代歌谣最多者是《元诗纪事》，《古今风谣》《古谣谚》是辑录元代歌谣最多的专辑，《元诗选癸集》是辑录元代歌谣最多的诗歌总集。《黄道婆谣》《乌鸦叫叫》等是至今仍流传于民间的元代歌谣，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今日观之，它们是真正意义上发表了的民间歌谣。《河南北童谣》典籍载录的频次最高（18次），其他依次是《元末苏州童谣》（10次）、《方国珍谣》（9次）、《江南谣》《元初蓑县皇舅墓谣》《元明宗时童谣》《元顺帝时童谣》《至正丙申松江民间谣》《至正五年淮楚间童谣》均为5次。歌谣被收录和引用的频次，充分说明歌谣本事在当时及后世的关注程度和影响力。

在时间的分布上，元代歌谣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自然地与传统上对于元朝的历史分期相吻合。各个时期歌谣主题的倾向，基本上反映了元代初期、中期、末期不同阶段的时代特点。元代前期的歌谣（7首）表现了这一时期民族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化的思想倾向；元代中期的歌谣（12首）表现了执政集团内部尖锐的矛盾冲突和行政区域划分改革的弊端；元代末期的歌谣数量最多（64首），是元代人民对蒙元统治怨恨情绪总爆发的最鲜明映射，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整体矛盾异常激化的动荡时局。

在地域的分布上，中书省和江浙行省最多。京师是利剑所指之处，是全国舆论的中心。江南三省尤其是江浙行省因民怨最为沸腾、民变及大起义多发，歌谣或为起义制造舆论，或为民间自发对事态进行评价、预测，对推动起义的进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元代歌谣在时间的分布上集中于元末顺帝统治期间，在地域的分布上集中于江浙行省，在歌谣的主题上，时间和地域的分布基本重合，充分体现了元末江浙行省所受压迫最深、反抗也最为激烈的历史。

从歌谣看历史，视角自下而上，一部歌谣小史就是一部民间史。利用歌谣进行历史研究，是一个较新的研究视域。从民间歌谣入手，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来解读他们自己的历史，是对以往研究中多重视正史而忽视口头文献的观念和做法的一种突破。诚如吕宗力先生所言：“对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流言、讹言或‘谣言’及其相关语境进行认真考察和研究，将有助于历史学者提示官式文本、主流思维之外的另类真相或史观，解读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心理氛围，描绘出更多维、多层、多彩的历史图像。可惜的是，尽管这样的类谣言或谣言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中俯拾即是，却并未在严肃的中国史研究中获得应有的重视。”^③以元代歌谣透视元代社会，会对元代历史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认识。

The Study of the Distribution Condition on the Folk-songs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YAN Xue-ying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folk-songs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have its era characteristics. The more the content of the folk-songs fully had been edited in literature records, the more it strongly influenced the following dynasties. The time distributing of the folk-songs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focuses on the last governance time by the Emperor Shun, the region distributing focuses on 3 provinces in Jiangnan. These fully show the history of deeply pressure between the authority and people revolted against it in Jiangnan provinces during the last period of Yuan dynasty.

Key words: the folk-songs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the frequency of the literature record; the time distributing; the region of the distributing

(责任编辑: 闫丽)

①[元]姚桐寿著，李梦生校点《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六），《乐郊私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102页。

②[清]钱谦益撰，张德信、韩志远点校《国初群雄事略》，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6页。

③吕宗力《汉代的流言与讹言》，《历史研究》，2003年2期，第14页。